

也论党的领导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

——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

郑 寰 祝 军

内容提要: 回顾许多后发赶超型国家的历史经验,政府往往把国有企业作为发展工具。然而,以国有企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否能成功,却面临着许多挑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克服后发国家的“国企病”提出了中国方案。许多学者呼吁,只有“找回政党”,才能理解中国国企公司治理的国家特性。文章基于公司控制权的理论,尝试提出综合性分析框架,从所有权、管理权、劳动权三个维度来讨论党的领导和国企公司治理的关系。中国经验显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有助于保障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国有企业 党的领导 公司治理 国企党建

中图分类号: F12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18)02-0123-07

一、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挑战

在反思国家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了重新评估(Amsden 2001; Trubek 2010)。研究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展国家都把国有企业用作重要的发展工具。在这些国家,“大部分企业(至少是大部分工业企业)是由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组成的企业部门。这意味着政府实施其产业政策通常较少依赖于正式的法律与监管规则,而更多依赖于直接的所有权以及政策制定者与一小群知名企业家之间的联系。”(OECD 2016:15~16)在缺乏更加灵活的产业政策、市场机制和监管能力时,国家所有权能够为政府提供一种灵活的工具,用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后发国家的政府通过培育个别“国家冠军企业”,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建立“互惠控制机制”,推动组织学习和技术创新,实现经济赶超。

新发展政治经济学推进了对国家发展进程中中国企角色的理解。然而,以国有企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否能成功,面临着重重挑战。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不断暴露的公司治理丑闻,低效能和公共部门腐败,让人们对政府干预国有企业产生了广泛质疑。回顾后发国家的历史经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常容易染上“国企病”:

一是国有经济的寡头化。一些发展中国的经验显示,国有企业逐渐演变成一个密不透风的体系,所有权不能有效行使,最终导致公共利益的损失,催生出庞大的“公司帝国”,导致政府逐渐丧失对企业的监管^①。随着商业集中的趋势,政府官僚深陷于庞大的政商关系网络中,国企很可能沦为利益集团的

作者简介: 郑寰,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祝军,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助理研究员。

^① 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公司政体”(Corporatocracy)的概念被广泛使用。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在《一个经济打手的自白》中,揭露了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丑闻。查尔斯·德伯、罗伯特·怀特等人则用“Corporation Nation”(公司国家)的概念来分析美国公司治理对公共权力的损害。在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不断弱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越来越成为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力量。在经济全球化中,第三世界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同样面对着这些问题。

工具,从而使国有企业偏离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

二是国有企业的家族化。由于政府掌握国有企业的董事长、经理人的任命权,这些企业职位常常被作为恩庇交换的条件。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容易蜕变为“裙带资本主义”。有关韩国和菲律宾金钱政治的研究显示,私人关系和家庭纽带在两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菲律宾,“100个大家族”控制着该国经济命脉,20位大股东掌控了菲律宾60%~90%的注册企业,而其中排名前五的大股东更是握有一半以上的企业控制权,其中就包括很多国有企业。精英之间通过联姻等方式培育私人关系,衍生出庞大的政商支持网络,导致大量的徇私枉法和腐败丑闻(康灿雄,中译本,2010)。

三是“内部人控制”的问题。青木昌彦对苏联东欧转型经济的研究发现,在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企业经理在公司内部构筑起了强有力的控制权,把企业变成了独立王国(青木昌彦,1995)。随着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日趋复杂,治理透明度不断衰减。在繁复的决策机制下,管理层滥用职权的情况屡屡出现。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的调查,韩国国有企业普遍出现了管理层滥用职权的乱象。国有企业的重复竞争、过度投资与全面生产过剩,导致企业债台高筑。2012年底,韩国286家国有企业的负债总额达463.5万亿韩元。其中,28家主要国有企业的总负债额达到393万亿韩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警告,国有企业负债比例过高可能拖垮韩国经济。

四是国有企业的泛政治化。研究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常常在国企发展中掺杂社会政策的目标,最终导致国企被政治和公众的期望丧失企业自主性。OECD(2016)报告指出,拉丁美洲的工业化政策和发展政策很快被有权势的家族或者劳工运动所挟持,使国企不堪重负。例如,巴西政府利用国有企业追求社会目标 and 政治目标,保持价格稳定和低失业率,在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国有企业分散了对盈利能力关注,损害了国有企业的绩效和投资能力。

面对这些困境,新古典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病根在于“所有者缺位”、“产权错位”、“激励不足”,关键的方案是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一些激进的改革者开出药方,呼吁“非国有化”、“私有化”、“民营化”,主张把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在政企关系上,主张政治控制退出企业,主张建立国有企业的宪政治理架构。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一些国家把“非国有化”作为国企公司治理的改革方案。苏联的国企改革是最典型的案例。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在苏联的国企改革中,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等人就提出了以非国有化为主要特征的“500天计划”。他们认为,只有私人所有者才会积极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呼吁在500天内,至少70%的工业企业要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私有化大大加速。1995年起,俄罗斯寡头通过“债转股”(Loans for Shares)交易,许多苏联时期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红色老板”对内部股份和贬值的职工股份进行了收购,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①(罗澜,2012;科兹,2016)。在叶利钦时期,新兴资本家形成了“七寡头统治”,甚至捆绑了政治权力的运作,俄罗斯的国有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

与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路径不同,中国共产党仍维持着国有企业的政治控制权。有学者注意到:“中国遵循的政策多多少少和新自由主义策略相反。尤其是,中国并没有立即私有化大型国企。相反,在数十年保持大型国企不脱离国家掌控的同时,创造了开办新的非国家的、市场导向的企业有利可图的条件。中国将逐利动机导向了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掠夺国家财产。其结果就是世界上最高的生产性投资率和过去25年里所有大国中最快的GDP增长速度。”(科兹,2016:269)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衰落显示,经济绩效的大规模提高不需要产权的私有化。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中国至今仍然采用主要是资产公有的所有制形式。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五个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而这些投资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中国国有经济的成功经验对新古典公司治理理论提出了挑战。

^① 按照这种私有化的交易模式,银行家们变成股份的受托人,获得直接的控制权。一旦贷款无法偿还,股份以及股份所具备的对公司的正是所有权,就会转到银行受理。

二、“找回政党”: 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

《OECD 公司治理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99) 提出: “好的或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是具有国家特性的, 它必须与本国的市场特征、制度环境以及社会传统相协调。”在公司治理的比较研究中, 有学者把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称为“股东模式”(Shareholder Model), 其核心特征被概括为“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在这种模式下, 股权更加分散化, 倾向于保护小股东和外部投资人的利益。股东通过选举董事会来对管理者进行监督,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形成有效的制衡体系, 从而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则被归纳为“相关利益者模式”(Stakeholder Model) 或“大股东模式”(Blockholder Model)。这种模式的特点与美国相反, 强调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紧密联系, 对小股东和外部投资人很少提供正式保护, 主要通过大股东直接监管或干预的方式来控制管理层。例如, 日本通过主银行制度、企业间交叉持股来实现公司治理, 与英美模式存在重大的差异 (Dore, 2000; Gourevitch & Shinn, 2005)。

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体系是该国复杂的政治经济体系内生演化的结果。那么, 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国家特征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呢? 2016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会议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系统论述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的关系, 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他指出: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要立足我国国情, 不要生搬硬套外国的做法。公司治理本来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英美模式’也好, ‘德日模式’也好, 只是公司治理一般性原理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反映。……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有企业当然要同大的体制合拍, 不要向西方企业看齐, 也不可能看齐。”(习近平, 2017: 176) 这些重要论述将对未来国企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也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要求。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 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转型中的角色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只有“找回政党”, 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市场转轨 (Brødsgaard, 2012)。舍甫琴科 (Shevchenko, 2004) 认为, 中国共产党通过掌控国家资产, 对私有化过程进行有效控制, 阻止和预防了转型中存在的重大危险。在缺乏相关制度的条件下, 党扮演了重要的替代功能, 引导了创造市场的过程, 强化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竞争环境, 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尽管在转轨中, 中国也出现了大量寻租和腐败现象, 但通过党的不断调适和纠错, 限制了无节制的利润寻求行为, 防止了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的形成。皮尔森 (Pearson, 2005) 提出, 中国在市场转型出现了“规制型国家”, 而中国共产党是规制改革的最终裁决者。党的利益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得到表达, 中组部和国资委掌管着重要经济监管机构 and 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党内议事协调机构对企业治理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中国公司治理的国家特征。然而遗憾的是, 主流的公司治理理论中, 党的领导和作用仍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企业治理体系内部如何运作, 对很多研究者来说仍然是一个黑箱 (Pearson, 2005; Brødsgaard, 2012)。比如, 党委选人用人对于决策过程会产生什么影响? 谁决定任命、选拔和更换企业领导人, 相关决策会在何时, 如何执行? 为什么一些企业领导人长时间占据岗位, 而另外一些则频繁交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中, “找回政党”的任务仍然远未完成。

三、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基于公司控制权理论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党企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有经济中所扮演的作用, 已经变得更加复杂, 国企党的建设也一度出现了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的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企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得到了显著强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经过多年的实践,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 必须一以贯之; 建设

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要把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习近平 2017:176)

经过改革,党的领导的法定地位得到明显加强,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参见表1)。在正式的法律层面,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进行了明确规定。《公司法》第十九条要求“公司应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而在党章党规层面,2017年的新《党章》对国企党组织的作用专门进行了修订,第三十三条规定:“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①。这些具体条文规定了党的领导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对于领导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靠谁做,对于党组织如何围绕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工作,如何与法人治理结构有机结合等问题仍然有待实践。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党的领导怎样才能完善公司治理?而不是阻碍公司治理?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细致的讨论。

表1:关于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正式制度安排

2017年《党章》第33条	<p>国企基层党组织的五项基本职责:</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2) 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 (3) 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4) 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 (5) 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
2013年5号文(《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对中央企业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规定	<p>五个方面的要求:</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落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要求落到实处,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2) 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形成权力制衡、运转协调、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3) 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和党管人才原则,建立完善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建立高素质经营管理者队伍和人才队伍。 (4) 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统筹内部监督资源,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有效性。 (5) 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领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导企业文化建设,树立报效国家、造福社会、服务人民、关爱职工的企业形象。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相关文件。

尤其是,党组织在克服后发国家的“国企病”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论解释。企业党组织政治控制的目标不明,从而低估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本文以公司控制权的理论为基础,把公司内部治理体系视为一个权威结构,试图从所有权、管理权、劳动权三个维度,提出一个整合性的框架,以此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国企公司内部治理中的作用^②。

(一) 所有权的维度:党的领导与国资监管

从所有权来看,党的领导在保障国有产权和国资监管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最

^① 新修改的党章增加了国企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的表述。删除了“企业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一条文修改明确了党委、企业基层党组织在不同层次所发挥的不同功能,避免了含混不清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的争论。

^② 从政治控制权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党组织的作用的文献并不多见。张介和黄曼丽(2004)分析了党委会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他们提出,在公司治理较弱和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的情况下,党委对企业决策的政治控制是转型经济体的选择,而政治控制的程度取决于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平衡,即要在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进行平衡。他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本文也尝试从政治权力的角度分析公司内部,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权力关系。

主要的表现就是“把方向、管大局”。所谓把方向, 主要体现为确保国有企业坚持改革发展正确方向。所谓管大局, 就是要坚持在大局下行动, 议大事、抓重点, 加强集体领导、推进科学决策, 推动企业全面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从实践来看, 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的国有经济没有走上俄罗斯式的私有化道路, 避免了国有经济的寡头化和家族化。

尽管国有企业改革试点中, 部分国有企业也出现了大量不规范行为, 甚至导致国有资产出现流失。但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丧失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仍能够不断纠正改革的错误。例如, 针对国企混改可能存在的风险,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明确提出: “国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要把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作为必要前提。”习总书记也强调,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基本政策已明确, 关键是细则, 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 不能在一片改革的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习近平, 2014) 实践证明, 在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 特别容易出现“法律空转”的现象。企业党组织在内外约束下所发挥的“把方向、管大局”的作用, 实际上弥补了法律缺位, 法律执行不足的问题, 有助于防止出现关联交易、借口市场经济改革, 变相售卖国有资产等行为。

十八大以来, 国企党建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在对企业的访谈中我们得知, 很多国企高管一致认为, 党的建设最大的功能就是内部监督和廉洁建设。在许多国企内部, 纪检和巡视覆盖了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各类班子成员, 贯穿企业决策、监督、执行整个管理环节, 对企业的公司治理的规范化起到了良性促进。党内监督, 是企业内部监督的主要方面, 也是国外企业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党组织可通过建立完善党建重大问题风险防控机制, 用法律、制度手段维护党纪国法的权威, 维护国有资本的权益, 保证国有企业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

(二) 管理权的维度: 党的领导在决策、用人中的作用

保障国企经营权、管理权的相对独立性, 是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曾有步骤地改变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责任制, 党的领导已经不再具体干预生产经营。随着董事会制度、监事会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不断完善, 企业党组织已经不再扮演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和指挥中心的角色。在国企公司治理中, 党委(党组)并不是要取代董事会、经理层的作用, 而是与其他治理主体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约的公司治理机制。

然而, 我们也看到, 企业的过度“管理主义”往往会造成重大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企业经理和厂长等内部人一旦缺乏约束, 反而容易导致企业经营效益衰落。回顾一系列企业重大决策失误的案件, 董事会、监事会、外部董事存在盲目投赞成票的问题, 在追责机制匮乏的情况下, 导致制衡机制难以发挥。一些国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山头林立, 很容易变成独立王国。企业党组织在干部人事任命和企业决策上所拥有的重要权力, 客观上有助于强化企业内部的制衡机制, 遏制管理权的过度膨胀。

此外, 用人权是出资方最关注的控制权。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国企公司治理中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一些学者注意到,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国有企业领导人选拔、任用和晋升中的作用。由于党管干部等制度性的限制, 使得大型国有企业很难形成正式的利益集团。柏思德(Brødsgaard, 2012) 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任命和控制, 对中组部和国资委在干部任命、干部交流系统在党企关系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 从人事的角度, 党委(党组)有效控制着管理层, 但不是否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选人用人权, 党组织主要在“确定标准、规范程序、参与考察、推荐人选”等方面发挥把关作用。

在实践中, 党委(党组)对管理层的控制, 主要是发挥“参与决策”的作用, 通过党组织研究“三重一大”事项来制衡管理层。当然, 这不是要替代董事会对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 也不是要取代经理层对企业的经营权。党委(党组)对管理层的控制, 主要是对董事会和经营层保持一定的否决权, 通过程序进入董事会和经理层, 对企业运作产生程序性的影响。一些学者从决策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例如, 马连福等人讨论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行为对企业冗余雇员和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 验证了国有企业党组织从内部对企业进行了干预。他们以 A 股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党委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为研究对象, 检验了对公司治理和董事会效率的影响

(马连福等 2012、2013)。当然,企业党组织如果过度控制,则有可能扭曲生产决策。

(三) 劳动权的维度: 党的基层组织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处理企业职工与管理层、所有者的关系。在公司治理的主流理论中,常常把产业工人视为人力资本,把国企职工的问题简单化约成劳动成本的问题,忽略了技能积累、组织学习等方面的作用。中国的国企拥有4000多万在岗职工、1000多万党员、近80万个党组织,这支庞大的产业大军是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骨干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巨变中,国企职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中国国企实现了沉痛的转身,面貌焕然一新。回顾这一过程,国企基层党组织在维护和谐劳动关系,凝聚人心、化解矛盾、调解利益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企业党组织在平衡劳方与资方关系,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上仍然扮演着重要作用。魏昂德对中国企业权力结构的经典研究指出:一个强大的党政合一国家从无到有地制造出了一个在政治与经济上都依附于企业和管理企业的下级官员的工人阶级。他认为,尽管经历了改革开放,党组织的形式本身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它继续保持自己的一套组织体系,继续通过做思想工作来稳定企业的发展。组织了个人忠诚、相互关照、物质利益组成的复杂的大网,在社会中产生了长期稳定的对政权的默认与积极合作(魏昂德,1996:277)。

企业基层党组织在控制劳动权上,主要体现为“保落实”。即领导群众组织并发挥其作用,凝心聚力完成企业中心工作。对国企基层党组织来说,主要工作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工作,通过发挥企业党员职工的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提升企业治理的软实力。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职工队伍结构也呈现出很多新特点的情况下,国企基层党组织同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激发企业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能动性上起到重要作用,在促进职工有序参与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多经验,真正起到了把员工组织起来的重要作用。

公司治理涉及企业内部权力关系的平衡。中国的经验表明,企业党组织实现所有者、管理层和企业职工的良性互动,对克服“国企病”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要实现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机统一,企业党委(党组)要发挥好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确保国有企业坚持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决遏制国有资产的流失,推动企业全面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避免出现国有企业的寡头化和家族化;在企业内部的各个治理主体之间,要处理好党委与董事会、经理层在用人权、决策权之间的分工协作,保证好管理权、经营权的规范化运作,克服“内部人控制”和管理层滥用职权问题;企业基层党组织要平衡好职工的利益,形成和谐的劳动关系,避免公司治理的“泛政治化”和“民粹化”,形成有利的组织学习和能力积累环境。只有弄清楚公司治理的目标,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参考文献: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 2012:“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内部人控制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2 8。

——2013:“国有企业党内组织治理、冗余雇员和高管薪酬契约”,《管理世界》2013 5。

习近平 20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在细则”,中国广播网,2014-03-10, http://finance.cnr.cn/txcj/201403/t20140310_515036256.shtml。

[英]彼得·罗澜 2012:《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市场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隋福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美]大卫·M.科兹、弗雷德·威尔 2016:《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5:《OECD 公司治理原则》,张政军译,张春霖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16:《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贾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美]康灿雄,2017:《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李巍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日]青木昌彦,1994:“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的若干问题”张春霖译,《改革》,1994,6。
- [美]魏昂德,1996,《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Amsden, Alice Hoffenberg, 2001.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 –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ødsgaard, Kjeld Erik, 2012. “Politics and Business Group Formation in China: The Party in Control?”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624 – 48.
- Dore, Ronald Philip, 2000. *Stock Market Capitalism: Welfare Capitalism: Japan and Germany Versus the Anglo – Sax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urevitch, Peter Alexis, James Shinn, 2005. *Political Power and Corporate Control: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earson, Margaret M., 2005. “The Business of Governing Business in China: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f the Emerging Regulatory State.” *World Politics*. 57(2): 296 – 322.
- Shevchenko, Alexei, 2004.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the CCP and the Traject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 – Communist Studies*. 37(2): 161 – 85.
- Trubek, David M., 2010. “Developmental States and the Legal Order: Towards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Law.”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075.

On CPC’s Leadership and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OEs: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s SOEs

Zheng Huan & Zhu Ju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Abstract: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SOEs) are usually used as a developmental tool by many catch – up countries. However, SOE governance is currently in face of a variety of difficulties. Good CPC performance in SOE governance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public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experts asser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the Party back in understanding China’s miracles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control rights, the thesis offers an analytic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CPC’s role in SOE governance. It argues that it would boos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 owned sector of the economy if CPC organizations in the enterprises could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owners, managers and employees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unification of strengthening Party leadership and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SOEs; CPC’s Leadership; Corporate Governance; Party Building

(责任编辑: 党成孝)